

台灣地理語言學研究史的分期及其特色

洪惟仁

anguijin@gmail.com

1. 台灣地理語言學研究史的分期

從研究史的觀點，可以把台灣地理語言學的研究分為幾個時期：

1) 日治時期（1895-1945）：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了有效統治台灣，對台灣的各方面做了科學的調查，調查範圍及繪製的地圖都涵蓋了整個台灣，並且都相當精細，有關漢族的祖籍調查和原住民的氏族調查提供了語言史科學的史料。語言調查以小川尚義為主導，小川尚義在地理語言學上的主要成就在於大量而細密的台灣南島語語料蒐集，具體的成就是進行了分類，並繪製分佈地圖（小川等 1935）。漢語地理語言學還沒有開始，只有相關的族群分佈調查，並繪製漢人祖籍分佈圖。

2) 蔣治時期（1945-1987）：在蔣家政權統治台灣時期，戒嚴了 38 年，在大中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政治氛圍下，台灣本土的各方面極少官方的科學調查研究。語言學方面只有「國語」、「國音」和聲韻學受到重視，方言學研究不被鼓勵，甚至受到壓抑。語言地理學研究，漢語研究成果只有兩種，鍾露昇的《台灣閩南語的分佈》（1967）宏觀調查成為台灣漢語地理方言研究的開山之作；顧百里的《澎湖群島方言調查》（1978）開創了台灣區域地理語言學。南島語方面土田滋及李壬癸對台灣南島語的調查、分類、分區及語料文獻的整理研究做了很多貢獻。尤其土田滋可以說是小川尚義的繼承人，把小川尚義的調查成果賦與南島語地理語言學的生命，貢獻厥偉。

3) 民主化以來（1988-）：李登輝 1988 年上任總統以後，政治轉向民主化、本土化，台灣各語言的方言學調查開始獲得生機，進入 21 世紀的陳水扁時代（2000-2008）後更是蓬勃發展，地理語言學主要的研究成果都是千禧年以後才發表的。

宏觀的研究，如龔煌城團隊（1988-1996）完成了閩南語地理方言學調查，累積了大量的方言語料，但尚未整理、發表；卜溫仁 1993 年開始台灣漢語地理方言學調查，2008 年才發表。

區域性的、微觀的調查成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是這個時期的特色。

語言地理學方面有鄭錦全團隊的家戶調查，如：新豐（蕭素英、吳品慧、鄭錦全

洪惟仁

2004、鄭錦全 2006）、崙背（黃菊芳、蔡素娟與鄭錦全 2012）、新埔、後龍、南庄，而鄭錦全所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2012）標誌著微觀語言地理學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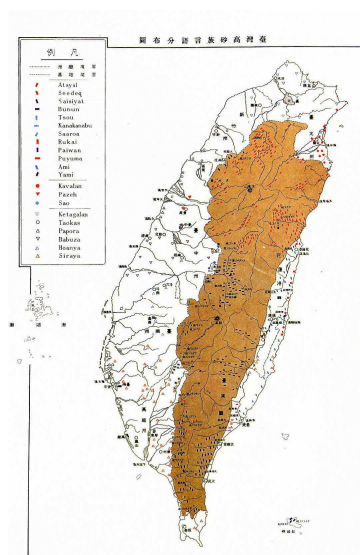
洪惟仁團隊的區域地理學研究，如台北（潘科元 1996，洪惟仁 2009）、彰化（涂文欽 2009）的閩南語方言分類與分區的研究；又如高屏地區（2004, 2006）、關廟方言區（2007）、南投（2008）、新竹（2008）、宜蘭（2009）、桃園（2009）、台中（2009）、西北海岸（2010）、雲林（2010）等區域的語種分佈研究論文；張素蓉（2006）、簡秀梅（2006）方言漸層分佈的研究論文。

此外，張屏生團隊發表了澎湖白沙鄉（張屏生與李仲民 2011）、澎湖縣（張屏生與李仲民、呂茗芬 2011）、嘉義縣（張屏生、蕭藤村、呂茗芬 2010）；李香儀則以其鹿港地理方言學研究（2003）獲得碩士學位；李仲民也以地理語言學研究（2009）獲博士學位，並把日本 glottogram 研究法引進台灣（李仲民 2011、蔡惠名 2011）。葉尚芳（2011）亦同時以其地理方言學研究獲得博士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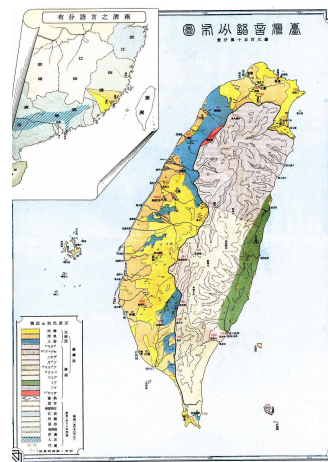
2. 台灣地理語言學的特色

台灣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可以歸納出四個特色：早生而成長緩慢、精細的微觀調查、研究方法的多樣性、複雜的歷史造就特殊的理論研究。分述如下。

2.1 早生而成長緩慢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高砂族語言分佈圖」



小川尚義「臺灣語言分佈圖」

小川尚義 1907 年就發表了一張「台灣言語分布地圖」，這張地圖發表的時間只比日本國內發表《音韻調查報告書》（1905）和《口語法調查報告書》（1906），晚了兩年，和《法蘭西語言地圖集》出版的 1902-09 約

略同時。因此可以說台灣的語言地

圖是趕在世界地理語言學的潮流之先發表。

台灣的語言地圖以「語言區劃圖」為主，屬於語言地理學研究的作品。語言地理學研究需以地理語言學為基礎，否則其區劃可能因沒有科學的根據而缺乏可信度，這顯示台灣語言地理學的研究早熟而成長不良。小川地圖（1907）的問題就在於語言區劃不是根據語言調查，而是根據祖籍調查，把閩粵等同於閩客，因此失去了科學的根據。小川與淺井（1935）不論「生蕃」或「熟

著」的分類與分布都相當精準，只可惜小川團隊並沒有交代這些地圖是怎麼畫出來的。戰後土田滋根據小川團隊留下的語料進行比較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的研究，雖然有了小地方的修正，基本上證實了小川團隊的區劃圖的確是有地理語言學基礎的。

土田滋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較語言學的，他是用詞彙統計數字來顯示語言或方言的分類，把個個語言或方言點做了定性，把定性的方言點畫在地圖上，繪製成南島語語言或方言分布圖，並沒有用地圖繪製等語線，根據等語線束進行語言區劃的過程，這並非地理語言學的方法。

至於漢語方面，自來只有比較方言學的研究，完全沒有地理方言學的基礎研究。戰後鍾露昇《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算是台灣方言地理學的開山之作，但只調查了 27 個詞條，畫了 27 張變體分布圖，因此本研究只能說是試驗性的研究。

台灣地理語言學的發展要等到民主化才獲得充分的滋養，21 世紀才蓬勃發展起來，無論是宏觀的或微觀的研究，都呈現百花齊放的盛況，多樣化的論文都是 21 世紀發表的作品。民主化初期就開始調查的卜溫仁詞彙調查，也到了 21 世紀才發表了 3 個詞彙的社會地理方言學研究（Brewer, 2008）。

台灣地理語言學從出生到開始成熟發展，經歷了將近 100 年，因此我們總結其發展史是「早生而成長緩慢」。

雖然如此，台灣地理語言學的生長良好，他有幾個特質是其他地區比較缺乏的，就是下述的「精細的微觀調查」、「研究方法的多樣性」。調查太精細，蒐集的資料太龐大，也可能變成發展緩慢的原因，因為資料越龐大，出版的可能性越少，學者花費太多精力在蒐集資料，也可能磨損其發展理論的精力。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卻顯示台灣人創造力的爆發，加上台灣複雜的歷史及語言環境是造就特殊的方法與理論的溫床，我們對台灣地理語言學的未來持樂觀的看法。

2.2 精細的微觀調查

早期的台灣地理語言學研究，往往是先把語言區劃成果繪製成地圖，但沒有交代語言區劃的調查研究過程。從表面看，這些語言區劃可能是任意的，缺少科學性，事實上也有確有任意發揮想像力的作品，但也有不少研究具有豐富的語料基礎，只是因為資料太龐大，還沒有整理或沒有機會發表。

小川團隊的原住民語料是相當的微觀而精細的，但直到戰後才被土田滋和李壬癸團隊發掘、整理出來。還有土田滋和李壬癸也做了普遍的調查，整合起來，資料相當龐大，但至今也只做了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這些豐富而精細的調查語料絕對可以用來繪製台灣南島語變體分布圖，進行正式的地理語言學研究。

漢語地理方言學，雖然起步較晚，但都是相當精細的調查。如鍾露昇（1967）的台灣閩南語調查，調查 448 人，共 174 個方言點，平均分佈於台灣各區鄉鎮，共得

洪惟仁

2,104,704 筆資料；龔煌城團隊的台灣閩南語方言調查，調查對象針對戰前出生的老派台灣閩南語母語人，總計調查人數 280 人，調查方言點 127 個，調查語料詳表約 100 個詞項，簡表約 600 個詞項，已整理為資料庫之語料共 180,419 筆，尚有近半資料未整理，將來可以繪製 1000 張以上的臺灣閩南語變體分佈圖。卜溫仁（Brewer, 2008）的調查，雖然只調查 3 個詞條，但是光是一個「鵝」字就調查了閩南人 983 人、客家 89 人，共 1,102 人。列如下表：

調查研究者	調查詞項	調查點	調查人數	語料筆數
鍾露昇（1967）	27	174	448 人	2,104,704
龔煌城團隊（1988-1996）	600~1000	127	280 人	180,419 近半資料未整理
卜溫仁（2008）	3		1,102 人	

至於區域地理方言學的調查更精細，調查點密度從每村里一個人以上到每鄉鎮級一個以上的受訪者。如顧百里（1978）和張屏生（2011）的澎湖方言調查，李香儀的鹿港方言調查（2003），簡秀梅的關廟方言調查（2006），蔡惠名的旗津半島語言地理 Glottogram 調查（2011）都是逐村調查；張素蓉的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調查（2006），涂文欽彰化縣閩南語調查（2009），洪惟仁團隊進行中的雲嘉閩南語調查（2009-），每一個鄉鎮至少 4 個調查點，方言區交界地帶幾乎逐村調查；洪惟仁團隊的台北方言調查（2009），張屏生團隊的嘉義方言調查（2010），李仲民的西海岸的方言調查（2011），每一個鄉鎮一個以上受訪者。而最精細的莫過於鄭錦全團隊的家戶調查（2004-）了，就選定的鄉鎮進行逐戶語言使用調查。列如下表：

調查研究者	調查範圍
洪惟仁團隊（2009） 李仲民（2011）	一個鄉鎮 1 個以上受訪者
張素蓉（2006） 洪惟仁團隊（2009-）	一個鄉鎮 4 個以上調查點， 方言區交界地帶幾乎逐村調查
顧百里（1978）張屏生（2011） 李香儀（2003）簡秀梅（2006） 蔡惠名（2011）	逐村調查
鄭錦全團隊（2004-）	就選定的鄉鎮進行逐戶語言使用調查

2.3 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台灣地理語言學發展史三個時期中，第一、二期的研究方法是比較傳統而規格化的，到了第三期，政治民主化了，學術開放了，研究方法也變得相當的多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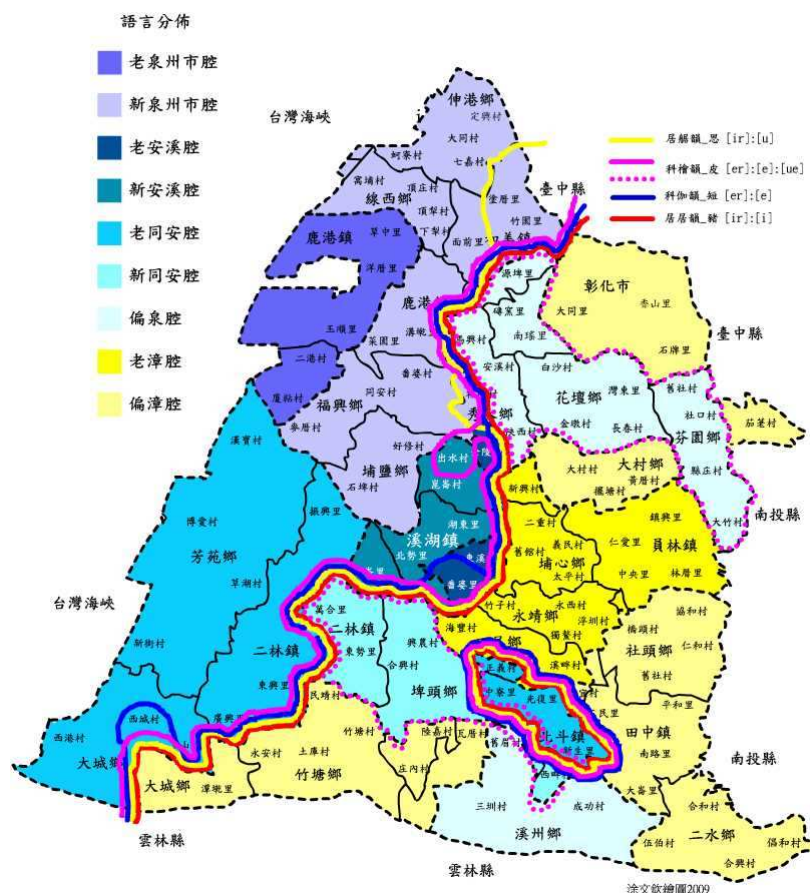
第一時期的成就主要是繪製語言區劃地圖。這個發展趨勢可能是為了因應台灣總督府統治台灣這個種族、語言分布都相當複雜的殖民地的需要。這雖然屬於臆測，但台灣南島民族的種族、語言比起漢族來複雜得多，而且清代對於原住民的了解只限於「熟番」，對於「生番」幾乎是一片空白。總督府為了「撫蕃」，必須先了解原住民，因此對原住民的各方面都花費了龐大的精力。小川尚義後期把精力全部投入南島語的研究，除了個人的興趣外，不能說不是為了因應總督府的統治需要。¹

蔣治時期的語言地理學成就在於繪製變體分佈圖，鍾露昇（1967）、顧百里（1978）都是這個目的，這是延續歐洲地理方言學的傳統，規規矩矩地進行調查，把調查採集的變體畫在地圖上。但南島語採用比較、分類，繪製區劃地圖的方法，似乎是沿襲小川尚義的傳統。

進入民主化以後，台灣的地理語言學研究開始多樣化了，傳統方法在區域地理方言學調查繼續使用，如洪惟仁團隊的台北（潘科元 1996，洪惟仁 2009）第一次用語言區劃線表現等語線、彰化（涂文欽 2009）第一次明確地繪製等語線束；張屏生團隊的澎湖（張屏生與李仲民 2011、張屏生與李仲民、呂茗芬 2011）、嘉義（張屏生、蕭藤村、呂茗芬 2010）以不同的顏色表示變體分佈區。

¹ 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退休時將退休金全部捐給台北帝大，目的就是請言語研究室和土俗人種研究室進行台灣原住民研究。總督府重視台灣原住民更甚於漢族研究由此可見一斑。

〈單元音央元音類〉等語線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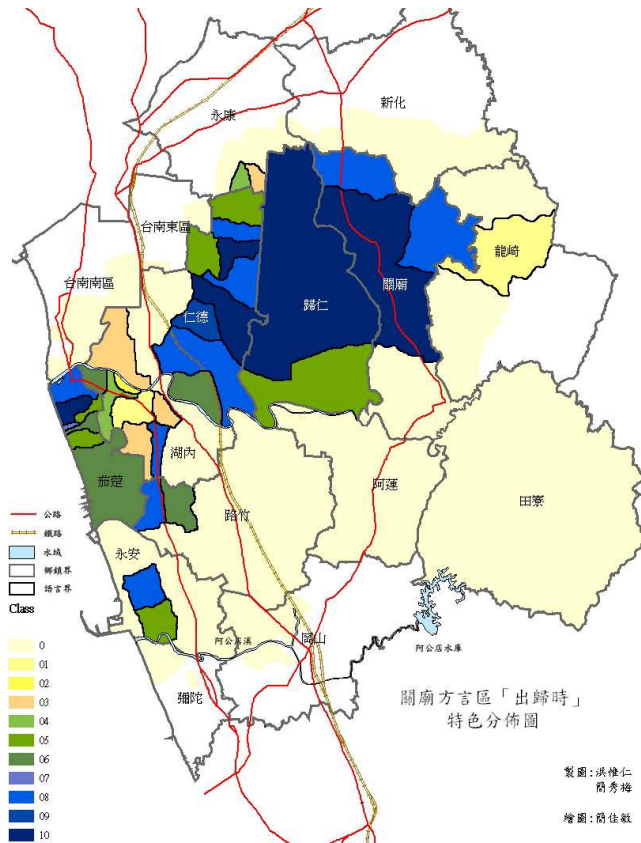


涂文欽「彰化縣閩南語泉州〈單元音央元音類〉變體等語線束圖」

但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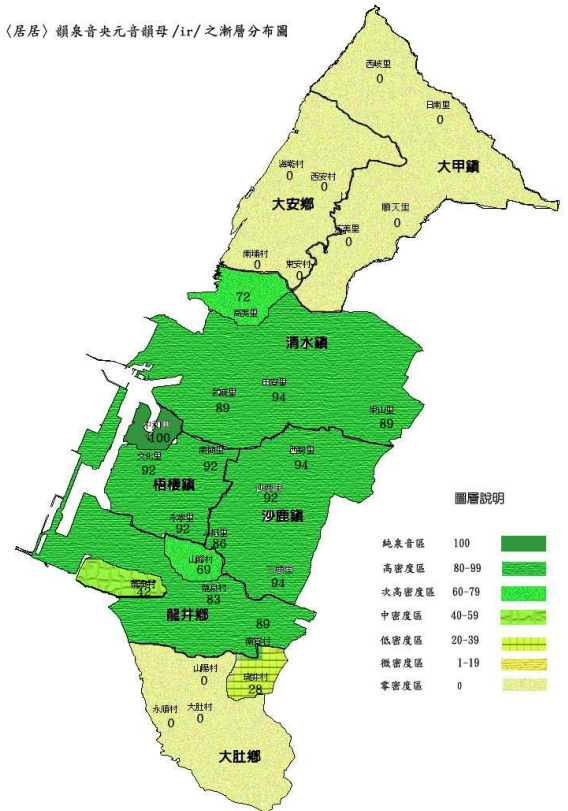
2.3.1 地理語言漸層分佈的研究

這個方法的基本概念是認為等語線、語言區劃只是一種假設，語言的實際是漸層分佈，必須有更密集的調節點，繪製多等語線，才能顯示漸層分佈狀態，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漸層分佈研究（張素蓉 2006、洪惟仁與張素蓉 2008）、關廟方言區「出歸時」之地理分佈研究（簡秀梅 2006、惟仁與簡秀梅 2012），兩篇都畫出「方言等高線」。在語言地理學方面有洪惟仁團隊一系列的區域地理學研究，而集其大成是本地圖集，這些區劃地圖畫的多分界線，表現語言使用的及方言性質的漸層變化。



簡秀梅「關廟方言區出歸時漸層分佈圖」

〈居居〉韻母央元音韻母 /i/ 之漸層分佈圖



張素蓉「泉州音央元音/i/的漸層分佈圖」

2.3.2 社會地理語言學的研究

這個方法是將社會語言學的因素摻入地理方言學的研究。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是日本地理方言學家（詳參 1.2.5 節）創發的 glottogram 研究法，在台灣只有李仲民團隊採用（李仲民 2011，蔡惠名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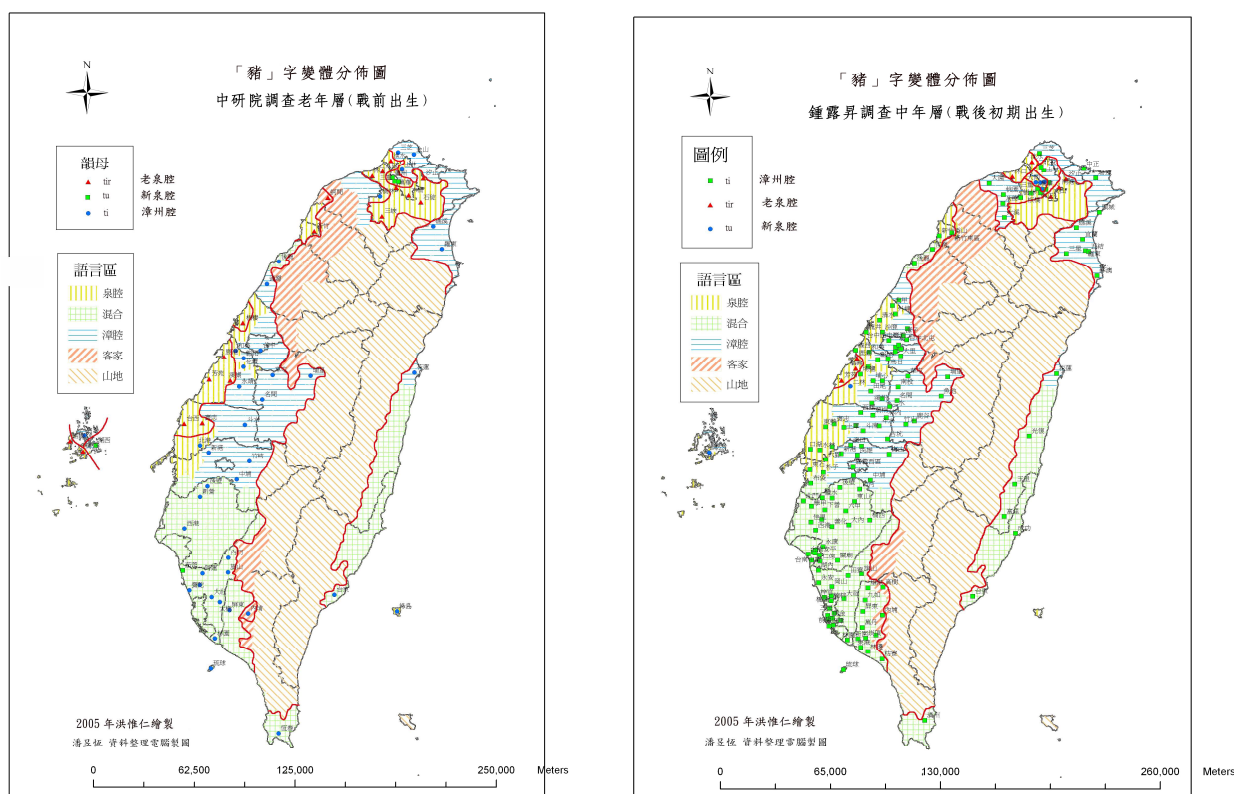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竹 南 鎮	後 龍 鎮	通 霄 鄉	苑 裡 鎮	大 甲 鎮	大 安 鄉	清 水 鎮	梧 棲 鎮	龍 井 鄉	伸 港 鄉	線 西 鄉	鹿 港 鎮	福 興 鄉	芳 苑 鄉	大 城 鄉	麥 寮 鄉	台 西 鄉	四 湖 鄉	口 湖 鄉
1910E							C												
1920E								C		C		C	Ct						
1930E	Ct	J	J	J	Ct	J			J		C			C	J	Ct		J	
1940E							C										Ct		J
1950E	J	J		J		Ct	C	Ct				C			Ct		J		J
1960E			J		Ct				Ct		Ct	C	Ct			J			
1970E		J					C	C	J	Ct	Ct		Ct	C				Ct	
1980E	J		J	J		Ct						J		C	J	J	J		Ct
1990E					J					J		J						J	

臺灣中部地區西部沿海海口腔 Glottogram---「皮」鞋

資料來源：李仲民〈Glottogram（グロットグラム）在地理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實例〉（2011:45），表中代號 C：/phə/（泉州腔）、Ct：/phe/（同安腔）、J：/phue/（漳州腔）。

台灣本土的社會地理語言學研究最早是洪惟仁團隊分別從地理方言學和社會方言學進行，簡秀梅碩士論文（2006）的社會方言學和地理方言學在同一篇論文中用二度空間地圖、和變體年齡分佈表分別呈現。

採用複數地圖呈現年齡變異，而進行「表面時間比較」（apparent time comparison）研究的有洪惟仁和卜溫仁。洪惟仁（2005）比較龔煌城團隊調查戰前出生的以及鍾露昇（1967）調查戰後初期出生的變體分佈，利用 12 張地圖 6 個字類的變體分佈呈現兩個世代方言地理分佈的變化。



龔煌城團隊調查戰前出生（左）以及鍾露昇調查戰後初期出生（右）「豬」字音變體分佈之變化

卜溫仁將變體和年齡層做了交叉比對，依 5 個年齡層繪製了 5 張變體分布圖，顯示[gɿ]的分布區由南部逐漸向北部擴散，而[go]的分布區逐漸縮小（Brewer 2008: 232-234）。

2.3.3 語言使用家戶調查研究

鄭錦全院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從 2004 年以來進行了竹縣新豐鄉、雲林縣崙背鄉、新竹縣新埔鎮、苗栗後龍鄉、南庄鄉的語言分布調查。除了精細的語言分佈地圖，對於各村語言使用比例有精確的統計。

2.3.4.2 語言接觸的解釋

語言的變化有時是因為語言接觸引起的。語言變化隨時、隨地都在發生，但是有些變化擴散得慢、有些變化擴散得快，有些新生的語言形式不能擴散到言語社區之外，但有些形式卻可以傳播得很遠，關鍵在於語言競爭的勢力。新形式的擴散原通常都是「中央」（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或「中原」地帶，中央的強勢語言向周邊擴散，越遠離中原地帶保存的舊語越多，這就是「周邊分佈論」（波傳論、方言周圈論）的主要論據，但所謂「中央」或「中原」的重點是在它的語言競爭力，而不是空間的中央。台灣客家話、南島語受到華語、閩南語的強烈影響一般都是採用這種理論來解釋。洪惟仁與簡秀梅（2012）解釋關廟方言「出歸時」的回頭演變（s→tsh）就是採用「方言接觸」、「方言競爭」來解釋。

但強勢語言也可能移借弱勢語言而成為新形式，如台灣華語大量移借台灣閩南語的語音及詞彙，語言學家通常認為是「副層語言」（adstratum）。台灣的客語相對於閩南語是弱勢語言，但是客語不完全是單向的移借閩南語，有些已經閩南化的所謂「鶴佬客」雖然不會說客語，但卻在他們的閩南語留下一些客語的特徵，甚至向周邊閩南語區擴散，而成為區域特徵，這叫「底層效應」（substratum effect）。洪惟仁研究「入歸語」（j→g）現象，發現〈入〉字頭聲母（約當於中古音日母）g-變體多半分佈於「鶴佬客」地區及其周邊，他用「客語底層效應」來解釋（洪惟仁 2013）。

2.3.4.3 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研究

台灣的語言、地理、族群的分佈及其互動關係相當複雜，往往不是語言內因或語言接觸足以解釋。因此我們覺得必須和地理學、歷史學、民俗學、人類學，甚至考古學進行跨領域合作。

薩丕爾(Sapir:1916)認為方言最複雜的地方就是語言的擴散發源地，李壬癸引用這個理論，認定台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而南投縣是泰雅語、布農語等許多語言的發源地；但他論定泰雅語 Squliq 方言是後來插入 Ts'oli'方言分佈區，卻都是引用歷史文獻有關原住民的移民紀錄來佐證，不是引用周邊分佈理論。（詳參李壬癸 1992、1993）

洪惟仁〈高屏地區的語言分佈〉（2006）引用屏東地區開發史及簡迥仁「撞球原理」和「夾心餅乾原理」對現在閩南>客家>平埔>原住民的族群排序提出解釋。洪惟仁（2010）利用移川子之藏等 1935 與今日所調查之資料套疊重繪附圖「宜蘭縣原住民部落原址及其遷徙路線圖」，確認宜蘭縣原住民語言分佈地盤的變遷。這些都是跨領域研究的例子。

為了更好地進行語言學、地理學、歷史學、民俗學之跨領域合作研究，洪惟仁和韋煙灶、許世融共同發起舉辦「語言、地理、歷史跨領域工作坊」，從 2008 年 11 月在臺中教育大學舉辦第一場工作坊以來，每年至少舉辦二、三場，至 2013 年元月已經舉辦了 10 場，所發表論文將近 80 篇。²這些工作坊已經收到極大的正面效益。透過方言

² 這個工作坊所發表的會議論文都持續上傳於本工作坊網站 <http://www.uijin.idv.tw/ogawa/>，請進入「歷次議程與論文」網頁瀏覽。

地理學、族譜地理學、族群人口學的合作研究，許多語言分佈和原鄉移民人口的關係，語言地盤變體和族群遷徙、語言競爭的關係都得到確認。

另外是透過歷史考證，確認語言文獻的定位。譬如許世融（2011）考證一般相信是台灣第一張語言地圖的小川尚義所繪「臺灣言語分布圖」（1907）其實是根據台灣總督府 1901 年有關漢人祖籍人口的調查報告所繪，因此確認小川尚義所謂的「言語分布圖」實際上等於是漢人祖籍或原住民族分佈圖。這個考證對於釐清台灣族群分佈史和語言地盤變遷史的關係非常重要。

2.4 複雜的歷史造就特殊的理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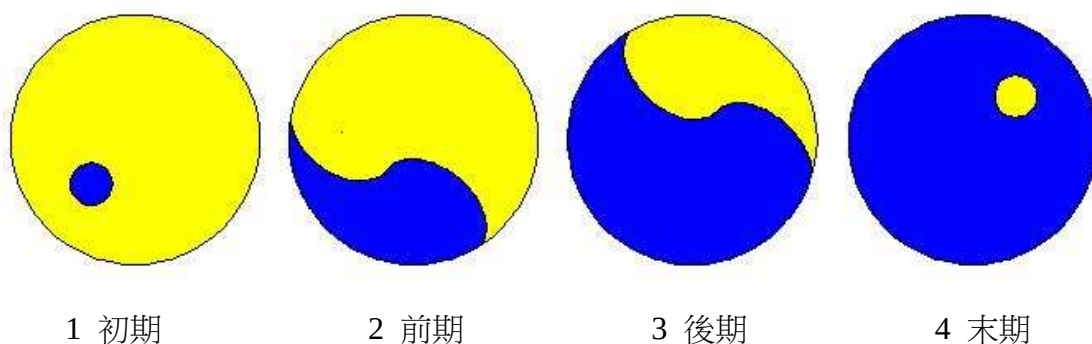
台灣本是南島語的分佈區，四百年前不同方言的漢族由不同原鄉移民台灣，一方面對原住民進行土地掠奪、語言同化，二方面錯雜而居的不同原籍的漢族之間也發生語言競爭、方言重整，三方面又曾經被不同的政權（荷蘭、鄭王朝、滿清、日本、中華民國）所統治。族群、語言相當複雜，族群間、語言間的競爭關係也相當激烈，語言地盤及語言形式的變化都相當迅速。這種環境和歐洲、中國、日本等族群、語言相對穩定的地區而言顯著不同。因此台灣是檢驗地理語言學理論最假設理想的場所。

施密特 (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 早在 1872 年就提出有名的「波傳論」(wave theory/ wallentheorie)，這是語言傳播最基本的模型，所以擴散理論，不管是否直接受到施密特的理論影響，都可以說是這個理論的延伸。柳田國男 (Kunio Yanagita, 1875~1962) 在所著《蝸牛考》(1930) 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論」，主張「古語殘存於周邊」，類似中國古語所謂「禮失求諸野」的意思。柴田武 (1969:32) 接受了「方言周圈論」，並且進一步應用到語言史理論的第二原則「周邊分佈原則」。

其實這是語言地理分佈發展普遍的現象，各家英雄所見略同。Bloomfield 的名著 *Language* (1933) 第 19 章「方言地理學」講的都是這個原則，意大利 Bártoli (1873~1946) 於 1945 年提出所謂「四個準則」，其中之一「周邊準則」(Norma delle Aree Laterali/norm of the lateral area) 指出「原本一致的區域被新語插入，周邊的區域傾向於保存古老形式」，講的就是這個原則，但他們都沒有說是唯一的「原則」，按 Bártoli 的說法只是「四個準則」之一而已。

台灣的語言地理學研究證實了「周邊分佈原則」只是一種現象。有很多現象，譬如原住民分佈區被漢語所包圍，但周邊的漢語是新語，中央的南島語才是舊語，這個事實違反了「周邊分佈原則」。又張素蓉台中縣海線地區泉州腔的調查 (2006) 和李仲民西部海岸線的 Glottogram 調查 (2011, 2012) 都證明了中央被包圍的泉腔是舊語，被周邊（用李仲民的說法是「兩端」）的漳腔包抄，逐漸萎縮；簡秀梅調查關廟方言，發現其「出歸時」(tsh→s) 特色被周邊沒有這個特色的方言所包圍，而快速地發生回頭演變 (s→tsh)。這兩個例子正好違反了「方言周圈論」中央是新語，周邊是舊語的假設。

既然「原則」出現了反例，這個原則就不是普遍的「原理」(law)，只能說是「傾向」(tendency)。為此，洪惟仁一系列的論文(洪惟仁 2010, 2012, 2013, Ang 2011)提出所謂「洪水論」，認為一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語言插入舊語分佈區之後可能像洪水氾濫一樣，猛烈擴張，終而發展到包抄舊語。「洪水論」並未否定「波傳論」，而是就波傳論的基本模式，進一步加以延伸與發展；「洪水論」也沒有否定「周邊分佈原則」，而是把它看成只是新語插入初期擴散的模式，而「洪水論」涵蓋了整個語言擴散的全程。洪惟仁(2013)進一步提出語言分佈發展的「類型論」，把由「插入」到「包抄」的連續體進行分割，將語言分佈發展的型態分為四個「類型」。這四個「類型」的發展模式如下：



新語舊語地盤消長階段模式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語言分佈發展的擴散論與類型論〉(待刊)。藍色表示新語，黃色表示舊語，1~4 圖顯示新語由插入，與舊語平分地盤，到包抄舊語的發展過程。

我們能夠獲得這些研究成果也許應拜台灣複雜的歷史與複雜的語言環境之賜。台灣是一個語言博物館，只有在這個擁有豐富語言資料的博物館才有機會看到多采多姿的語言地理分佈現象，才能發展出獨特的語言地理學理論。